

## 辛亥革命時期日本對保護在華日僑的外交舉措\*

朝野嵩史\*\*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後各省紛紛宣佈獨立，翌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最後使得清朝政府宣告終結。辛亥革命時期，圍繞中國的外交主要由英國主導，南北雙方經過交涉後，清朝皇帝決定退位，最終以共和政體完成南北統一。辛亥革命不僅對中國人，也對當時在華外僑產生巨大影響。辛亥革命爆發後，列強紛紛以護僑為由將軍隊派赴中國各地，加強在軍事力量。日本也以護僑為由，積極增援軍隊，並擴大自己的勢力。本文以辛亥革命為例，透過中日文檔案資料，分析辛亥革命期間日本的護僑舉措，並且探究其對後來中日關係的影響。

關鍵詞：中日外交、日僑、護僑、辛亥革命

---

\* 本文初稿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暨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學術交流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19年11月8日-9日。本文承蒙審查人審閱，在此特致謝忱。

\*\* 投稿時為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現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 一、前言

保護外國僑民議題是在中國外交史研究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中國於 1842 年《南京條約》開放 5 個通商港口，並於 1844 年根據《望夏條約》與《黃埔條約》，西方人士得以在通商口岸建立禮拜堂。到了 1858 年中國簽署《天津條約》後，西方人士得以到中國內地進行傳教。在西方人士進入中國內地後，護僑問題以及所謂「教案」，逐漸成為外交問題。當時中國對保護外僑並非袖手旁觀，但列強以護僑為理由出兵中國，行使砲艦外交，也甚至以護僑為藉口，取得在華特權。日本在明治維新後致力推進「文明化」與「富國強兵」，並於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後，分別取得在華權益。另外，日本僑民人數自日俄戰爭後急遽增長，其中居住中國東北的居多。<sup>1</sup> 在華日僑人數急遽增長後，護僑問題也隨之成為中日兩國的重要外交問題。日本透過過去西方列強對東亞所採取的軍事外交政策，從中摸索如何處理護僑問題的辦法，在日本加入列強行列之後，如同過去西方各國所採取的政策一般，將護僑作為外交手段，對中國進行干涉。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義爆發，革命影響很快波及到其他地區。翌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2 月，清朝政府宣告終結。日本朝野對於辛亥革命的反應十分複雜，日本官方支持中國維持君主立憲，但多數民間人士則對南方革命派予以同情。圍繞辛亥革命時期的外交環境，主要由英國所主導，經過交涉後，最終清朝皇帝決定退位，以共和政體完成南北統一。辛亥革命不僅對中國人，也對當時在華外國人產生巨大影響。辛亥革命爆發後，包括日本在內的列強以護僑為由紛紛派兵，加強在中國各地的軍事力量。

歷來研究辛亥革命時期的中日外交或日本對華政策的著作很多，代表

---

<sup>1</sup> 例如在 1910 年的統計資料，在華日僑人數總共有約 76000 人，其中約 62000 人居住於關東洲(旅順、大連)以及南滿鐵路附屬地。請見，沈殿忠主編，《日本僑民在中國》(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1883；2088。交通與日本帝國的發展向日本人提供了移居海外或殖民地的條件。當時日本人移民的國家或地區，例如美國(也包括夏威夷)、中國大陸(尤其是中國東北)、朝鮮半島、台灣、庫頁島等地。當時不少日本人認為，進步的國家均將使自己公民移居海外作為重要國策，也為了緩和人口壓力必須鼓勵移民。請見，〈社説・海外移民の必要〉，《東京朝日新聞》(東京)，1912 年 11 月 1 日(朝刊)，第 3 版。

研究例如有俞辛焯《辛亥革命期の中日外交史研究》、櫻井良樹《辛亥革命と日本政治の変動》等，但辛亥革命時期日本如何將「護僑」作為外交手段因應中國政局大轉變等問題，尚可進一步探究與分析。<sup>2</sup>武昌起義後，中日雙方都將保護在華日本僑民視為重要問題。一方面，「中國政府」<sup>3</sup>依據 1896 年《通商航船條約》規定必須負保護日本僑民之責任，<sup>4</sup>但在革命爆發後，各省陸續獨立，中國的權力結構變得相當複雜。由史料可以知道，軍政府以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其佔領地區對外國僑民的生命財產予以保護。另外，辛亥革命爆發後，日本政府令陸軍部隊派赴漢口駐紮，並在北京兵變後與其他列強聯合加強華北軍事力量。本文以辛亥革命為例，<sup>5</sup>透過中日文檔案資料，分析辛亥革命期間日本護僑的舉措，並且探究其對後來中日關係的影響。

## 二、武昌起義與日本對鄰近日僑的保護

武昌起義後，1911 年 10 月 12 日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在武昌成立，並由黎元洪(1864-1928)擔任都督。根據日本陸軍的報告，武昌起義當時，

---

<sup>2</sup> 探究日本保護在華日僑的研究，日文方面例如：瀨川善信，〈日清戦争(1894-1895)における居留民保護問題—在清公館引揚との関連において—〉，《埼玉大學紀要社會科學篇》24(1976): 1-21；瀨川善信，〈北清事变(1900年)における日本陸軍出兵問題—居留民保護との関連において—〉，《埼玉大學紀要社會科學篇》29(1981): 1-31；佐藤元英，《近代日本の外交と軍事—權益擁護と侵略の構造—》(東京：吉川弘文館，2000)。中文方面，陳志剛對美國的武力護僑政策予以分析。請見，陳志剛，〈1926-1941年美國在華武力護僑政策研究〉(南京：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論文，2014)。

<sup>3</sup> 辛亥革命爆發後，除了清朝政府之外，也出現中華民國軍政府以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等，隨著交戰與交涉的進展，實際控制的政權皆為不同，其情況錯綜複雜。武昌起義後，南方各省紛紛宣佈獨立，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於南京，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2月12日清室頒發退位詔書，清朝政府宣佈終結，3月10日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sup>4</sup> 1896年中日兩國簽訂的《通商航船條約》，其第一款規定：「大日本國大皇帝陛下與大清國大皇帝陛下、及兩國臣民。均永遠和好。友誼敦睦。彼此臣民僑居。其身家財產。皆全獲保護。無所稍缺」。請見，外交部編，《中外條約彙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4)，273-275。

<sup>5</sup> 本文探討的內容包括：武昌起義、各省獨立、在東北的交戰以及北京兵變等，在本文將這些事件統一稱為辛亥革命。

居住武昌的日僑有約 145 名，在漢口有約 1200 名，居住漢口各國租界的外國僑民人數達到 3000 名。<sup>6</sup>武昌起義後，11 日晚，各國領事開會討論，決議組織義勇隊，以保護各國租界及僑民，<sup>7</sup>日本方面則接到武昌起義的消息後，日本立刻派遣軍艦前往武昌，保護當地日僑，<sup>8</sup>於 12 日下午 1 時，日本軍艦「對馬」艦抵達武漢，海軍陸戰隊登陸，防衛日本租界，<sup>9</sup>並以日本第三艦隊司令官川島令次郎(1864-1947)為總指揮官決定各國「居留地防衛計劃」。根據 12 日漢口總領事松村貞雄(1868-1923)發出的電報，各國以海軍及義勇兵保衛租界，居住武昌的日本僑民皆已撤回，所有僑民均未受到傷害。<sup>10</sup>

從中國報紙報導的消息可以得知，武昌起義後，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元洪立即呼籲保護外國僑民，<sup>11</sup>並在 10 月 12 日，黎元洪照會各國駐漢口領事：「居留軍政府佔領地域內之各國人民財產，均一律保護」；「所有各國之既得權利，亦一體保護」等。<sup>12</sup>根據日本駐漢口總領事的電報，雖在武昌發生革命軍與滿人之間的軍事衝突，對於一般人民及外國僑民的生命財產卻沒有任何的攻擊。<sup>13</sup>革命軍佔領武昌、漢陽及漢口後，仍然保護外國

<sup>6</sup> 第 1 報，〈湖北騷擾事件〉，1911 年 10 月 12 日，《清國革命動亂二閱スル情報／陸軍ノ部 第一卷》，JACAR(亞洲歷史資料中心)，Ref. B03050622200(画像第 5 枚目)，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sup>7</sup> 櫻井良樹，《辛亥革命と日本政治の變動》(東京：岩波書店，2009)，181。

<sup>8</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 44 卷、第 45 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 53 號(東京：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61)，〈在漢口松村總領事致林外務大臣〉，1911 年 10 月 11 日，1。

<sup>9</sup> 櫻井良樹，《辛亥革命と日本政治の變動》，181。

<sup>10</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 44 卷、第 45 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 59 號，〈在漢口松村總領事致林外務大臣〉，1911 年 10 月 12 日，2；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 44 卷、第 45 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 62 號，〈在漢口松村總領事致林外務大臣〉，1911 年 10 月 12 日，2。

<sup>11</sup> 《申報》報導稱：「協統黎元洪現為革命軍大統領，已在武昌內外遍貼告示：一不許私匿官員；一不許傷及外人；一不許侵害商務；一不許攻擊外國義勇隊；一不許濫殺同胞」，與此同時黎元洪也規定：「保護外人的生命財產者均有賞」。請見，〈專電〉，《申報》(上海)，1911 年 10 月 12 日，第 1 張第 3 版。

<sup>12</sup> 程道德，《中華民國外交史資料選編(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1；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 44 卷、第 45 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 66 號，〈在漢口松村總領事致林外務大臣〉，1911 年 10 月 13 日，107。

<sup>13</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 44 卷、第 45 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在漢口松村總領事致林外務大臣〉，第 56 號，1911 年 10 月 11 日，46。

僑民，致力保持社會秩序。俞辛焯認為革命軍對外國僑民的權益十分予以保護；也認為，因為革命軍採取保護措施，當時列強沒有藉口干涉起義。<sup>14</sup>武昌起義後，革命軍立即表示保護外僑安全，並認真採取護僑措施，實際上外僑沒有受到嚴重的攻擊與影響。革命軍十分重視護僑，這是因為列強從晚清以來往往以護僑為由對中國進行干涉，革命軍基於過去經驗，對外僑予以充分的保護，以免受到列強的干涉。當時黎元洪蒙受來自內部與外部的兩種壓力。一方面是革命派與立憲派之間的矛盾與權力鬥爭日益嚴重，另一方面是武昌起義爆發後，清朝令陸海軍派赴武昌馳援，革命軍蒙受攻擊，情勢變得岌岌可危。<sup>15</sup>對革命軍而言，如何避免列強的打壓並因應目前所面臨的壓力是當時相當重要的問題。

除了保護日僑之外，保護日本在華權益也是十分重要的議題，其中，位於湖北省東南部的大冶是日本重要鐵礦來源。10月13日，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1864-1924)建議日本外務大臣林董(1850-1913)以護僑為藉口派遣軍艦前往大冶，並表示日本保護該權益的態度。<sup>16</sup>11月7日，第三艦隊司令官海軍少將川島令次郎與駐漢口總領事協商後，令翻譯生波多野會晤都督黎元洪，並向黎元洪要求不要影響大冶礦山的權益，黎元洪認為革命軍不會影響大冶山鐵礦生產作業，並將致力維持該地區的社會秩序。<sup>17</sup>10月22日下午6時10分，日本軍艦「隅田」艦抵達大冶。<sup>18</sup>日本令軍艦派至大冶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保護該地權益，另一方面是監視革命軍的行動，並將其該地情況報告海軍總部。11月17日，日本軍艦「千早」艦艦長南里團一

<sup>14</sup> 俞辛焯，《辛亥革命期の中日外交史研究》(東京：東方書店，2002)，9。

<sup>15</sup> 胡峰，〈黎元洪與民初政局〉(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67-69。

<sup>16</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255號，〈在清國伊集院公使致林外務大臣〉，1911年10月13日，46-47。

<sup>17</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300號，〈在上海有吉總領事致內田外務大臣〉，1911年11月12日，108；第34號，〈清國事變通報〉，1911年11月13日，《清國革命動亂二閱スル情報／海軍ノ部 第一卷》，JACAR(亞洲歷史資料中心)Ref.B03050627100(第35-36画像目)，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sup>18</sup> 第12號，〈清國事變通報〉，1911年10月23日，《清國革命動亂二閱スル情報／海軍ノ部 第一卷》，JACAR(亞洲歷史資料中心)Ref. B03050626700(第52画像目)，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1869-1931)參觀大冶水泥廠，<sup>19</sup>並與該公司辦事員張繼祖(生卒年不詳)會談。張繼祖表示，因日本軍艦停泊於大冶，使得該地得以維持平穩狀態。<sup>20</sup>由上述日本各方面的行動可見，日本極為重視大冶的權益，也深入調查該地公司的情況。回顧近代日本與中國的關係不難發現，日本積極投資大冶礦山，並取得資源。甲午戰爭後，日本大力推動鋼鐵工業的發展，在此過程中，需要大量且穩定的鐵礦原料。1899年，日本為了得到鐵礦石原料，與大冶鐵礦簽訂為期15年的購買礦砂合同。1904年，日本興業銀行借款給漢冶萍公司300萬日圓，並與該公司簽訂為期40年的購買礦砂、生鐵合同。自此以後約10年期間，日本興業銀行、橫濱正金銀行及三井物產會社多次借款給漢冶萍公司，其總額達到約2800萬日圓。<sup>21</sup>簡而言之，日本強化自己國家力量的過程中，大冶鐵礦具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後來在中日「二十一條」交涉時，大冶權益也成為重要議題，日本最後使中國接受要求，並進一步加強日本對該地的控制。<sup>22</sup>

### 三、各省獨立與日本保護各地僑民

武昌起義後，50天內，內地18個省中14個省陸續獨立，<sup>23</sup>由此可見，革命影響很快波及到其他地方。10月25日，南京領事鈴木榮作(生卒年不詳)

<sup>19</sup> 1910年2月，日本三菱借款給湖北大冶水泥廠，並於翌年(1912年)6月再度借款給該公司。三菱透過兩次借款將大冶水泥廠的絕大部分權益掌握在手中。然而，辛亥革命爆發後，該公司的經營陷入困境，後來武昌政府於1914年4月將借款歸還三菱，三菱全面退出大冶水泥廠的經營。請見，畠山秀樹，《三菱合資会社の東アジア海外支店—漢口・上海・香港—》(大阪：追手門學院大學出版會，2014)，42-43。

<sup>20</sup> 第30回，〈川島第三艦隊司令官ヨリ齋藤海軍大臣ニ提出セル清国事变ニ関スル警備報要領〉，1911年11月23日發，《清国革命動乱ニ関スル情報／海軍ノ部 第三卷》，JACAR(亞洲歷史資料中心)Ref. B03050628700(第39画像目)，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sup>21</sup> 杜恂誠，《日本在舊中國的投資》(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145。

<sup>22</sup> 1915年1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時，漢冶萍事項被納入第三號(共有兩款)。兩國經過交涉後，同年5月25日，中日雙方達成協議進行換文。中華民國外交總長致日本駐華公使之照會內容為如下：「中國政府因日本國資本案與漢冶萍公司有密切之關係，如將來該公司與日本國資本案商定合辦時，可即允准。又不將該公司充公。又無日本國資本案之同意，不將該公司歸為國有。又不使該公司借用日本國以外之外國資本」。

<sup>23</sup> 林家有主編，《辛亥革命運動史》(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423。

致電外務大臣內田康哉(1865-1936)稱，革命軍於 23 日佔領江西九江，該地經濟活動照常進行，包括日本僑民在內的所有外國僑民都沒有受到損害。<sup>24</sup>26 日，《申報》報導：「革黨據長沙後已宣告獨立並照會外人謂，果嚴守中立必極力保護，聞日總領事此時尚在城中，其餘西人均平安」。<sup>25</sup>29 日，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1876-1937)致電外務大臣稱，革命軍佔領湖南長沙後，實施軍政，恢復社會秩序，商店照常經營，革命軍派兵保護外國僑民的安全。<sup>26</sup>然而，由於 11 月 1 日湖南都督譚延闓(1879-1930)對日本駐長沙領事大河內隆則(生卒年不詳)表示，革命軍難以確保日僑安全，並建議僑民避難於水陸洲，故日本領事令領事館員以及日僑避難於日清汽船會社所屬「沅江丸」。<sup>27</sup>11 月 15 日，日本軍艦「隅田」艦長東條政二(生卒年不詳)報告稱，長沙當地的狀況日益平穩，避難於外地的中國人陸續返回長沙城內，但該地商業情況尚未完全恢復，每戶日僑住宅仍由數名軍人保護。<sup>28</sup>由此可知，革命軍佔領長沙後致力保持社會穩定與對外僑的保護，但該地治安與商貿狀況仍尚未完全恢復。

當革命的影響波及至廣東，廣東軍政府於 11 月 9 日宣佈共和獨立，次日胡漢民(1879-1936)就該地都督職。<sup>29</sup>英國方面為了因應廣東省的政局轉變，就近從香港派遣約 80 名海軍兵士前往廣東，並確保英國在廣東租界的權益。<sup>30</sup>由此可知，辛亥革命爆發後，英國關注著廣東形勢變化，立即派兵駐

<sup>24</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22號，〈在南京鈴木領事致內田外務大臣〉，1911年10月25日，11。

<sup>25</sup> 〈專電〉，《申報》(上海)，1911年10月26日，第1張第4版。

<sup>26</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148號，〈在上海有吉總領事致內田外務大臣〉，1911年10月29日，12。

<sup>27</sup> 第21回，〈川島第三艦隊司令官ヨリ齋藤海軍大臣ニ提出セル清国事变ニ関スル警備報要領〉，1911年11月9日發，《清国革命動乱ニ関スル情報／海軍ノ部 第二卷》，JACAR(亞洲歷史資料中心)Ref. B03050628000(第32画像目)，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sup>28</sup> 第29回，〈川島第三艦隊司令官ヨリ齋藤海軍大臣ニ提出セル清国事变ニ関スル警備報要領〉，1911年11月20日發，《清国革命動乱ニ関スル情報／海軍ノ部 第三卷》，JACAR(亞洲歷史資料中心)Ref. B03050628700(第29画像目)，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sup>29</sup> 林家有主編，《辛亥革命運動史》，445。

<sup>30</sup> 第30號，〈清国事变通報〉，1911年11月10日，《清国革命動乱ニ関スル情報／海軍ノ部 第一卷》，JACAR(亞洲歷史資料中心)Ref. B03050627000(第56画像目)，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廣東以捍衛英國權利。在英國派兵進駐廣東後，廣東軍政府訓令各方官員務必維持秩序，保護外人。<sup>31</sup>

11月初，南京情勢逐漸陷於緊張狀態，自7日晚起，南京城各城門關閉，並切斷交通。翌日(8日)早上，英國軍艦艦長通知日本軍艦「秋津洲」艦長布目滿造(1868-1945)稱，英國軍艦準備令未帶槍的英兵10名及將校1名登陸，並保護當地撤回的外僑以及領事館。除了英國之外，日本、美國以及德國軍艦也採取同樣措施。<sup>32</sup>數日後，「秋津洲」艦長向日本海軍大臣齋藤實(1858-1936)報告說，英美等國的婦女兒童均已撤回，而日僑均避難於日本領事館內，也令未帶槍的日本兵10名繼續保護日本領事館。<sup>33</sup>根據「秋津洲」艦長的報告，登陸南京的列強各國陸戰隊人數為如下：日本10名、英國10名、美國102名、德國不詳。<sup>34</sup>22日，革命軍交涉總長伍廷芳(1842-1922)向上海首席領事要求令居住南京城內的外國僑民立刻自該地撤回，日本駐南京領事對此回答說，革命軍在交戰時並未砲擊及攻擊日本僑民居住的地區，以免影響日本僑民的生命財產安全。<sup>35</sup>經過官革兩軍交戰，12月2日，南京城內的官軍宣佈投降，革命軍隨後入城，南京全城由革命軍控制。<sup>36</sup>

山東也受到革命影響，在革命黨及學生的壓力之下，11月13日，山東巡撫孫寶琦同意山東獨立，同時孫寶琦被推舉為都督，但山東軍官要求取消獨立，24日，孫寶琦(1867-1931)宣佈取消獨立。<sup>37</sup>12月1日，孫寶琦告知日本領事館事務代理相羽恆次(生卒年不詳)山東省取消獨立，也訓令當地中

<sup>31</sup> 〈專電〉，《申報》(上海)，1911年11月18日，第1張第2版。

<sup>32</sup> 第32號，〈清国事变通報〉，1911年11月11日，《清国革命動乱二関スル情報／海軍ノ部 第一卷》，JACAR(亞洲歷史資料中心)Ref. B03050627100(第2画像目)，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sup>33</sup> 第35號，〈清国事变通報〉，1911年11月14日，《清国革命動乱二関スル情報／海軍ノ部 第一卷》，JACAR(亞洲歷史資料中心)Ref. B03050627100(第52-53画像目)，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sup>34</sup> 第26回，〈川島第三艦隊司令官ヨリ齋藤海軍大臣ニ提出セル清国事变二関スル警備報要領〉，1911年11月14日發，《清国革命動乱二関スル情報／海軍ノ部 第二卷》，JACAR(亞洲歷史資料中心)Ref. B03050628100(第29画像目)，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sup>35</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121號，〈在南京鈴木領事致內田外務大臣〉，1911年11月24日，110-111。

<sup>36</sup> 林家有主編，《辛亥革命運動史》，443。

<sup>37</sup> 林家有主編，《辛亥革命運動史》，465。



國官憲對管內外國僑民予以保護。<sup>38</sup>山東取消獨立後，居住濟南的日本僑民仍然平安無事，當地情況穩定，無人從濟南撤回。<sup>39</sup>辛亥革命爆發後，日本、俄國等國令軍艦停泊於芝罘，並令陸戰隊登陸芝罘。根據 11 月 27 日的海軍資料，登陸芝罘的日本陸戰隊人數總共有 32 名，俄國陸戰隊有 10 名。<sup>40</sup>日本令軍艦停泊於芝罘的目的，除了護僑以及保護日本領事館以外，還有觀察山東政局與當地狀況。山東半島與遼東半島距離相近，因之使得日本擔憂起山東政局的變化與轉變對南滿地區的影響。

甲午戰爭結束後，日本開始注意福建省的利益，甚至也希望將福建省成為日本的勢力範圍。毫無疑問，這是因為福建省與台灣的距離相近，日本利用台灣的地理優勢試圖加強福建地區的權益。辛亥革命爆發後，日本也令軍艦派赴福州以及廈門等地，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並未趁辛亥革命之機展開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根據 11 月 27 日的海軍資料，登陸福州的各國軍隊人數分別為：日本 7 名、英國 25 名、美國 30 名以及德國 30 名，<sup>41</sup>從此可知，日本在福建省的軍事行動並非突出。如果日本趁機對閩採取積極態度，會引發其他列強的不滿與質疑，乃至對英日同盟關係以及列強之間的軍事平衡造成影響。當時日本仍受到其他列強的壓力，也必須考慮如何避免與西方各國產生利益衝突，因此，日本在福建並未積極展開軍事行動。必須注意的是，日本未在福建採取積極行動，並非意味著袖手旁觀，尤其日本在福建省擁有許多重要權益，如福建福州至台灣淡水間的閩台海底電線。<sup>42</sup>若是遭到革命軍的攻擊，切斷閩台之間的通訊，將對日本在華情報

<sup>38</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73號，〈在芝罘相羽領事代理致內田外務大臣〉，1911年12月5日，33-34。

<sup>39</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82號，〈在芝罘相羽副領事致內田外務大臣〉，1911年12月20日，35。

<sup>40</sup> 第49號，〈清國事變通報〉，1911年11月27日，《清國革命動亂二閱スル情報／海軍ノ部 第二卷》，JACAR(亞洲歷史資料中心)Ref. B03050628000(第6画像目)，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sup>41</sup> 第49號，〈清國事變通報〉，1911年11月27日，《清國革命動亂二閱スル情報／海軍ノ部 第二卷》，JACAR(亞洲歷史資料中心)Ref. B03050628000(第6画像目)，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sup>42</sup> 福建福州至臺灣淡水間鋪設的閩臺海底電線於1887年完成。1895年，日本在中日雙方交接台灣的交涉上提出電線的歸屬問題。雙方經過交涉後，1898年，中國以10萬

與戰略資訊造成極大的威脅。因此，確保臺海兩地通訊暢通，也是日本海軍被賦予的重要任務。<sup>43</sup>

#### 四、日本陸軍部隊之派遣與駐軍

武昌起義後，該地被革命軍控制，革命軍基本上對外僑安全予以保護，但根據日本駐漢口總領事報告，10月底，漢口租界陷入「頗為危險之地位」，官革兩軍交戰時，砲彈飛落租界內，為了保護日本僑民的安全，10月30日，日本總領事下令日本婦人、兒童及部分男子乘船撤回至上海。<sup>44</sup>10月20日，《申報》報導：「駐漢外交團報告，北京各公使云，官軍與革黨接戰砲彈飛落租界，毀物甚鉅，當由日英駐漢司令官出面抗議，革黨與官軍若不將交戰地遷移舊係有意侵害中立國租界主權等語，現革黨已遷往大別山，外交團仍守中立」。<sup>45</sup>31日，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將駐漢口總領事的報告轉告日本外務大臣，其報告說，官軍與革命軍之間的交戰造成多數軍人受傷，日本僑民也有1人受傷，該總領事請求日本政府與日本紅十字會交涉，將醫療人員及必要物品調到武漢。<sup>46</sup>日本外務大臣收到漢口總領事的請求後，與日本紅十字會進行了交涉，該會決定派遣由34人醫療人員組成的救護團，於日本租界內協助醫療活動，除了紅十字會之外，同仁會也為了協助當地同仁醫院，派遣醫療人員。<sup>47</sup>另外，在調查旅行中的東亞同文書院學生於11月

---

銀元的售價售予日本，並解決歸屬問題。閩台海底電線的中日交涉，可參見，林於威，〈閩臺海底電線與中日交涉之研究(1895-1904)〉(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0)。

<sup>43</sup> 例如在1911年11月11日，在福州的馬公要港部所屬第十驅逐隊司令狹間光大對日本海軍大臣報告閩台海底電線的狀況。請見，第33號，〈清國事變通報〉，1911年11月12日，《清國革命動亂二閣スル情報／海軍ノ部 第一卷》，JACAR(亞洲歷史資料中心)Ref. B03050627100(第26画像目)，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sup>44</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164號，〈在上海有吉總領事致內田外務大臣〉，1911年11月1日，56。

<sup>45</sup> 〈要聞一〉，《申報》(上海)，1911年10月20日，第1張第5版。

<sup>46</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163號，〈在上海有吉總領事致內田外務大臣〉，1911年10月31日，54。

<sup>47</sup> 同仁會在1902年成立於日本東京，其宗旨是促進中國以及亞洲醫學的普及。同仁會也將醫院設置於北京、漢口以及濟南等中國各地。關於同仁會的具體活動，請參見，

初逗留在武漢，調查旅行的記錄上提及，學生在革命軍的保護下自漢陽前往武昌，最後抵達漢口的過程。<sup>48</sup>東亞同文書院是東亞同文會在上海開辦、以培養從事中日提攜的人才為其宗旨的一所私立學校，長達幾個月的在華調查旅行是該校的教育特色之一。開辦東亞同文書院的東亞同文會辛亥革命爆發後，分派派遣員至中國各地進行調查。<sup>49</sup>

隨著官革兩軍交戰的戰況逐漸激烈，漢口商業會議所請求各國領事加強兵力，以保衛租界內的安全。對此請求，包括日本司令官在內的各國軍艦艦長表示拒絕。然而到了11月底，由於漢口戰局陷於惡化，情況極度緊張，故日本政府於12月11日正式決定派遣陸軍部隊，並令陸軍部隊交替登陸漢口，擔任護僑任務的日本海軍陸戰隊。<sup>50</sup>除了日本之外，俄國、英國及德國等各國也紛紛派遣陸海軍部隊，各國軍隊人數分別為：日本726名、俄國275名、英國162名、德國51名以及義大利38名。<sup>51</sup>

12月10日，日本外務大臣透過駐上海總領事通知駐漢口總領事日本政府內定派遣陸軍部隊，並請求總領事協助該地接受軍隊。<sup>52</sup>22日，日本外務大臣分別告知駐華公使及駐英國臨時代理大使山座圓次郎(1866-1914)，日

---

黃福慶，《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的第2章。又見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171號，〈內田外務大臣致在英國山座臨時代理大使〉，1911年11月9日，59；《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內田外務大臣致在上海有吉總領事〉，第93號，1911年11月9日，59-60。根據《申報》報導，日本紅十字會派遣34人，其包含醫生三人、製藥師一人、看護婦二人等21人，同仁會派醫療人員，其由醫生2人、製藥師1人及助手3人組成。參見：《申報》(上海)，1911年11月11日，第1張第4版。

<sup>48</sup> 東亞同文書院編，《東亞同文書院大旅行誌 5 孤帆雙蹄》，(東京：雄松堂出版，2006)，457。東亞同文書院是曾經在上海的一所學校，其宗旨是培養促進中日交流的人才。該學校特色有應屆學生進行的調查旅行，《東亞同文書院大旅行誌》是學生旅行記錄的一部分。

<sup>49</sup> 東亞同文會令派遣員派至成都、南京、南昌、福州、廣東(廣州)、寧波、武昌及長沙。請見，機密第47號，〈在廣東總領事瀨川澁之進致外務大臣內田康哉〉，1911年12月29日，《清國革命動亂ノ際東亞同文會ニ於テ同國各地ヘ駐在員派遣一件》，JACAR(亞洲歷史資料中心)，Ref. B08090247900(画像第4枚目)，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sup>50</sup> 櫻井良樹，《辛亥革命と日本政治の變動》，182。

<sup>51</sup> 櫻井良樹，《辛亥革命と日本政治の變動》，183-184。

<sup>52</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139號(極秘)，〈內田外務大臣致在上海有吉總領事〉，1911年12月10日，65。

本將派遣陸軍部隊，也請求將此決定轉告英國政府。<sup>53</sup>24日，日本外務大臣透過駐上海總領事告知駐漢口總領事，前往漢口的陸戰部隊主要任務為保護日本領事館及日本僑民，必要時也兼顧日本權益。<sup>54</sup>日本外務大臣向駐漢口總領事說明派遣陸軍部隊是「為了交替貴地海軍陸戰部隊」，那麼為何需要交替海軍陸戰部隊？海軍陸戰部隊為何不能繼續留在漢口？櫻井良樹解釋說，首先是為了保持列強之間的勢力均衡；其次是因為自12月18日，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廳，南北議和代表伍廷芳、唐紹儀(1860-1938)開始談判，日本海軍需要將停泊於漢口的海軍勢力調到上海，為此也需要將海軍陸戰部隊撤回。最後則因冬季長江水量減少，大型船舶將難以停泊。<sup>55</sup>

1912年1月1日，日本陸軍部隊平安抵達漢口，<sup>56</sup>其軍隊稱為「中清派遣隊」，後來改稱為「中支那派遣隊」。除了日本以外，還有英國、俄國、德國、義大利也令軍隊派赴漢口駐紮，從此可知當時列強之間仍存在聯合護僑的關係。但後來各國軍隊陸續自漢口撤退，到了1914年10月，俄國軍隊撤退後，駐紮漢口的部隊只剩下日軍。根據過去研究，日軍派遣隊駐紮漢口最初沒有軍營，臨時借用日本租界內的日僑建築等設施，但後來在租界外開始購買土地修建軍營。<sup>57</sup>日軍在租界外修建軍營的行動沒有條約依據，顯然是嚴重輕視中國主權的行動。1913年2月，黎元洪派湖北外交司長胡朝宗(生卒年不詳)往訪日本總領事館，希望日軍勿移駐至租界外。<sup>58</sup>然而，日軍派遣隊不但不顧中方的要求與抗議，而且也在1914年為了設置無線台，購買旁邊土地擴大軍營。<sup>59</sup>日軍長期駐紮漢口主要目的在於確保日僑

<sup>53</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397號，〈內田外務大臣致在清國伊集院公使〉，1911年12月22日，66；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226號，〈內田外務大臣致在英國山座臨時代理大使〉，1911年12月22日，66-67。

<sup>54</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163號，〈內田外務大臣致在上海有吉總領事〉，1911年12月24日，68。

<sup>55</sup> 櫻井良樹，《辛亥革命と日本政治の變動》，183。

<sup>56</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1號，〈在漢口松村總領事致內田外務大臣〉，1912年1月1日，69。

<sup>57</sup> 李少軍，〈民國初期在漢口之日本陸軍派遣隊述略〉，《近代史研究》2(2013): 83。

<sup>58</sup> 李少軍，〈民國初期在漢口之日本陸軍派遣隊述略〉，86。

<sup>59</sup> 李少軍，〈民國初期在漢口之日本陸軍派遣隊述略〉，85。

與日本租界，再加上也為了蒐集情報的需要。例如，陸軍軍人河本大作(1883-1955)於1915年被派至漢口陸軍部隊司令部工作，護國戰爭爆發後，河本接觸蔡鍔(1882-1916)，並蒐集反袁勢力相關的情報。<sup>60</sup>從情報工作與軍事戰略的視角而言，漢口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sup>61</sup>

## 五、東三省交戰與北京兵變

眾所周知，中國東三省為日本與俄國的勢力範圍，及至日俄戰爭後，日本繼承了旅順大連的租借權以及南滿鐵路等俄國權益，與此同時，日俄兩國開始摸索合作關係。經過日俄協定及密約，兩國更進一步加強在東三省的影響力。武昌起義後，日本關注該事件是否影響中國東北現勢發展。1911年11月10日，日本外務大臣致電駐奉天總領事小池張造(1873-1921)，指示在「南滿」發生官軍兩軍交戰時，日本不支持任何一方，嚴守中立，但外務大臣在另外一個電報中表示「除非需保護僑民及鐵路或帝國利權受到侵害，否則應避免軍事行動」。<sup>62</sup>日本陸軍大臣石本新六(1854-1912)訓令關東都督大島義昌(1850-1926)，其內容為由「關東都督需保護僑民或帝國利益受到侵害之時，可發動武力」等而成，<sup>63</sup>由外務大臣與陸軍大臣的電報可見，日本僑民或權益受到侵害時，日本也許改變中立態度。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1866-1925)在南京宣佈中華民國的成立，同時擔任臨時大總統。5日，孫中山發佈《臨時大總統布告友邦書》，其中有包括「凡各國人民之生命財產，在共和政府法權所及之域內，民國當一律尊重而保護之」。<sup>64</sup>當時，清朝皇帝溥儀(1906-1967)尚未退位，中華民國主權尚

<sup>60</sup> 北岡伸一，《官僚制としての日本陸軍》(東京：筑摩書房，2012)，138。

<sup>61</sup> 櫻井良樹，《辛亥革命と日本政治の變動》，185。

<sup>62</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207號，〈內田外務大臣致在奉天小池總領事〉，1911年11月10日，264-265；《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208號(極秘)，〈(別電)內田外務大臣致在奉天小池總領事〉，1911年11月10日，265。

<sup>63</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石本陸軍大臣致內田外務大臣〉，1911年11月12日，266。

<sup>64</sup> 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國父全集》，冊2(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26-27。除了保護在華外僑之外，南京臨時政府也對保護海外華僑的利益予以關注，但由於

未遍佈全中國，中國北方仍在清朝的統治之下。

1912年初，為了推翻清朝在東三省的統治，藍天蔚(1878-1922)被臨時大總統推舉為關外大都督，也被命為北伐軍司令官。1月16日，藍天蔚率領由學生組成的北伐軍計有2000名，搭乘「海容」艦等軍艦到山東芝罘。17日，藍天蔚以關外民軍都督的身份致電關東都督，要求嚴守中立，藍天蔚同時聲明對外國人民的生命財產予以保護。<sup>65</sup>18日，日本軍艦「常磐」艦艦長高木七太郎(1869-1933)在中國軍艦「海容」艦上會晤藍天蔚，艦長向藍天蔚表示官軍兩軍不要在「中立地帶」及租借地展開軍事行動，如需登陸「中立地帶」，登陸之前必須取得日方的同意。<sup>66</sup>在此提到的「中立地帶」是指俄國在1898年租借旅順大連時，在租借地北邊設定的隙地，中國雖然擁有隙地的統治權，但在取得俄國同意前，中國軍人不得進入該地。日俄戰爭後，俄國將旅大租借權交給日本時，日本同時也繼承隙地的規定。20日，日本軍艦「音羽」艦的將校在「海容」艦上會晤藍天蔚時，要求北伐軍不要進入「中立地帶」，<sup>67</sup>並告知日本外務大臣同意北伐軍登陸租借地與「中立地帶」以外的地點。<sup>68</sup>日本方面雖然屢次向藍天蔚要求不要登陸租借地及「中立地帶」，2月初北伐軍仍登陸「中立地帶」，並與清軍交戰，日本外務大臣訓令關東都督，立即與北伐軍交涉，使北伐軍隊從「中立地帶」撤退，<sup>69</sup>在芝罘日本軍艦「常磐」艦長向北伐軍司令部要求從中立地帶撤軍，大連民政署長也

---

當時中國尚未統一，因而保護海外華僑的實質交涉未獲成功。請見，李盈慧，〈「民國」政府保護「國民」：民初革命黨的保僑交涉與建言〉，收入麥勁生、李金強編著，《共和維新：辛亥革命百年紀念論文集》（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3），383-399。

<sup>65</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秘50號，〈在旅順大島關東都督致內田外務大臣〉，1912年1月18日，294。

<sup>66</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夕十、28號，〈第二艦隊司令官致齋藤海軍大臣〉，1912年1月18日，294-295。

<sup>67</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機密信第1號，〈在芝罘相羽副領事致內田外務大臣〉，1912年1月23日，298-301。

<sup>68</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8號，〈內田外務大臣致在旅順大島關東都督〉，1912年1月24日，301。

<sup>69</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13號，〈內田外務大臣致在旅順大島關東都督〉，1912年2月6日，322。

對藍天蔚提出抗議，藍天蔚表示，立即使北伐軍從「中立地帶」撤軍。<sup>70</sup>日本駐奉天總領事落合謙太郎(1870-1926)會晤東三省總督趙爾巽(1844-1927)時，也要求總督使官革兩軍從「中立地帶」撤退，總督則要求日軍不要干涉東三省的治安，總領事回答說，日軍只要負責保護日本僑民的生命財產及日本利益，並非以干涉東三省內政為其目的。<sup>71</sup>2月12日，清朝皇帝宣佈退位，完成南北統一，在東三省的官革兩軍經過交涉後，25日，北伐軍退到山東芝罘。<sup>72</sup>

2月12日，清朝皇帝退位，由袁世凱(1859-1916)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23日，袁世凱發佈保護外僑的布告，其內容為如下：

現在共和成立，人民程度日進文明，凡我友邦在華人士，尤宜誠悃相孚，益敦睦誼，以期邦交穩固，共享和平，獲躋世界於大同，保我國民之名譽。值此大局初定，人心浮動，地方秩序諸待維持，所有旅華各國人民生命財產，應由該地方官及駐紮各軍隊切實保護。倘有疏，該地方文武將吏均難稍辭其責。本大總統謬承國民推舉，勉擔義務，所捲捲抱者，尤以國利民福、輯睦邦交為重。望各地方長官及各將領轉飭所屬、所部，共悉此錄，一律遵行，特此布告。<sup>73</sup>

2月29日晚，北京發生兵變，<sup>74</sup>有1名在華日本人受到輕傷，日本旅館及商店遭掠奪，整體日本僑民損失並不嚴重，<sup>75</sup>但北京市區陷入無政府狀態，日本駐華公使下令日本僑民到日本公使館避難，以確保安全。<sup>76</sup>3月2

<sup>70</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秘第257號，〈在旅順大島關東都督致內田外務大臣〉，1912年2月7日，324。

<sup>71</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111號，〈在奉天落合總領事致內田外務大臣〉，1912年2月13日，328-329。

<sup>72</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90號，〈在芝罘相羽副領事致內田外務大臣〉，1912年2月25日，355。

<sup>73</sup> 程道德，《中華民國外交史資料選編(一)》，13。

<sup>74</sup> 關於北京兵變的爆發原因，迄今仍有許多討論。北京兵變的史料分析，請參見，王金山，〈民國元年北京兵變詳考：兼談史料與北洋軍閥史研究〉(濟南：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sup>75</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154號，〈在中國伊集院公使致內田外務大臣〉，1912年3月1日，584-585。

<sup>76</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162號，〈在中國伊集院公使致內田外務大臣〉，1912年3月2日，585。

日，唐紹儀致函英國公使，北京情況陷入危險，請求召開外交團會議設法防止掠奪屠殺，因此主席公使召開外交團會議決議各國軍隊巡邏北京市區，也決定增援約 1000 名軍隊，其中日本軍隊人數約 100 名。<sup>77</sup> 日下午 2 時起，八國聯合軍隊約 700 名一同行軍。<sup>78</sup> 對於此次暴動事件，袁世凱一方面向各國駐華公使提出歉意，另一方面也令代理外交總長胡惟德(1863-1933)親自往訪各國公使館慰問，藉此緩和各國不滿的情緒。<sup>79</sup> 因為當時北京社會秩序尚未完全恢復，為了防止兵變再度發生，袁世凱令駐紮張家口的陸軍第一鎮調至北京。<sup>80</sup> 另外，根據《辛丑條約》規定，列強軍隊可駐紮北京使館區，但外國軍隊越界行軍影響中國主權，因此袁世凱於 9 日致函外交團無需再越界遊行。<sup>81</sup> 由以上可以得知，袁世凱一方面重視國家主權與社會秩序，另一方面致力維持與列強之間的良好關係。清帝退位後，袁世凱掌握了中華民國實權，然而當時中華民國政府還有外交承認與借款等問題需要解決，因此需要建立與列強之間的良好關係，並爭取外交承認與借款，進而鞏固北京政府的基礎。

3 月 3 日，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小幡西吉(1873-1947)報告天津各處發生火災，除有些日商受到損失外，有 1 名日本巡查受到輕傷，所有居住在天津城內的日本僑民均已移到租界內避難。<sup>82</sup> 天津地方當局認為只有中國之力量難以平息暴動，分別往訪日本司令官及日本總領事請求各國駐華軍隊協助警備，3 日下午召開領事團決議協助中國方面維持治安。<sup>83</sup> 大約此時，日本

<sup>77</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164號，〈在中國伊集院公使致內田外務大臣〉，1912年3月3日，588-589；參謀第393號〈一、清國駐屯軍司令官阿部少將電報報告〉，1912年3月4日，《清國革命動亂後ノ狀況ニ関スル各省及府県庁報告雜纂／陸軍省及參謀本部ノ部 第一卷》，JACAR(亞洲歷史資料中心)，Ref. B03050683400(画像第39枚目)，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sup>78</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176號，〈在中國伊集院公使致內田外務大臣〉，1912年3月3日，591。

<sup>79</sup> 〈專電〉，《申報》(上海)，1912年3月3日，第1版。

<sup>80</sup> 〈第一鎮調京入衛〉，《大公報》(天津)，1912年3月8日，第5-6版。

<sup>81</sup> 〈阻止外兵越界遊行〉，《大公報》(天津)，1912年3月12日，第5版。

<sup>82</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32號，〈在天津小幡總領事致內田外務大臣〉，1912年3月3日，591。

<sup>83</sup>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



為了強化在北京的軍事力量，決定從關東洲派遣軍隊，4日及5日，日軍分別抵達北京與天津，軍隊人數為1200人。<sup>84</sup>除了日本之外，美國、德國、俄國、法國也紛紛增援軍隊，於3月31日的各國華北駐屯軍人數超過1萬名，<sup>85</sup>各國軍隊人數分別為：英國2846名、法國1481名、日本2475名、美國1790名、俄國1090名、德國454名、義大利189名以及奧地利146名。<sup>86</sup>

列強紛紛增援軍隊，其主要目的在於動用軍隊維持華北秩序，並確保北京公使館區、各國租界以及居住該區域的外國僑民。列強各國在天津建立租界，也在義和團事件後將北京公使館區設置於北京東交民巷。從此可知，列強在華北地區擁有政治及經濟的巨大利益。清帝退位後，袁世凱掌握了中華民國的實權，但北京政局仍然動盪不安，列強擔憂自身權益受到傷害，以及影響在華僑民的安全，因此以護僑與確保權益為理由，紛紛加強華北駐屯軍的軍事力量。援引不平等條約，以強大的軍事勢力為後盾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這些列強的做法顯然反映著帝國主義時代的外交。

## 六、結論

武昌起義後，各國駐漢口領事為了保護外國僑民的安全決議組織義勇隊，日本政府也派海軍陸戰隊保護日本租界。中華民國政府鄂軍都督黎元洪聲明保護外僑安全，在武昌起義的過程中，日本僑民沒有受到傷害。武昌起義爆發後引發各省獨立，各地革命軍政府也致力保護外僑的生命財產，日本僑民沒有受到嚴重的傷害。10月底，在漢口的戰役變得激烈，日僑紛紛赴滬避難。列強各國以保護外僑與租界安全為理由，令陸海軍部隊派赴漢口。1912年2月底，北京兵變爆發，有1名日本人受到輕傷，日本駐華公使令日本僑民前往公使館避難。3月，列強為了確保華北地區的秩序與外僑安全，紛紛派兵，在同月31日的華北駐屯軍總數達到1萬名以上。而日

---

第36號，〈在天津小幡總領事致內田外務大臣〉，1912年3月3日，592。

<sup>84</sup> 櫻井良樹，《辛亥革命と日本政治の變動》，73-74。

<sup>85</sup> 櫻井良樹，《華北駐屯日本軍》，85、279。

<sup>86</sup> 櫻井良樹，《華北駐屯日本軍》，279。

本派駐漢口的軍隊，卻在各國撤兵後毋願離去，自然引發中國的抗議。

辛亥革命期間日本所採取的護僑措施，一方面與其他列強保持合作，尤其是在華北地區根據《辛丑條約》規定行使軍事行動，但在另一方面，1914年後日本在漢口單獨駐軍，而且在租界外邊購買土地建立兵營，這些都是嚴重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而日本陸軍以及部分日本政治家試圖趁機給予南北雙方援助，並在日本的主導下將中國分為兩個獨立國家，進而加強日本對滿蒙以及中國關內的控制與影響力，但西方各國對此日本的行動紛紛表示反對，也予以牽制。<sup>87</sup>日本無法順利實施其企圖的原因首先是，當時英國在東亞國際秩序仍擁有主導權，日本作為同盟國必須尊重英國的意見與主導；其次是，在英國的主導下袁世凱順利完成南北統一，也得以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最後，在辛亥革命期間，列強權益與外僑幾乎沒有受到嚴重傷害，使得日本難以藉護僑之名積極干涉。

回顧近代中外關係不難發現無論是西方國家或是日本都試圖藉口護僑擴大自己的勢力。但值得一提的是，從日本與西方各國的關係與交涉當中，可以發現日本也曾經有類似的經驗。自黑船事件以來，日本江戶幕府與西方各國簽訂不平等條約，開放港口並建立外僑居留地。英法兩國以保護外僑安全為理由向日本要求駐紮日本，當時「小國」日本當然無法抵抗西方「大國」，最後不得不接受這一要求。1863年，英法兩國開始駐紮日本橫濱，外國軍隊的駐軍嚴重侵犯日本主權，日本著名政治家岩倉具視(1825-1883)將其英法駐軍稱為「皇國之恥辱」。<sup>88</sup>日本成立明治新政府後，正式對英法兩國要求撤軍。經過交涉後，於1875年1月英法兩國駐日公使與日本外務卿寺島宗則(1832-1893)達成協議，英法兩國正式同意自橫濱撤軍。同年3月2日，英法兩軍368名分別乘船撤退，前往香港。<sup>89</sup>長達約12年的英法兩國駐軍給日本造成深刻的「恥辱」經驗，但日本加入列強行列後，如同其他列

---

<sup>87</sup> 北岡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 1906-1918年》(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9)，89-96；俞辛焯，《辛亥革命期の中日外交史研究》，205-213。

<sup>88</sup> 橫濱對外關係史研究會、橫濱開港資料館編，《橫濱英仏駐屯軍と外国人居留地》(東京：東京堂出版，1999)，47-48。

<sup>89</sup> 橫濱對外關係史研究會、橫濱開港資料館編，《橫濱英仏駐屯軍と外国人居留地》，52-53。

強一般將帝國主義的外交手段，應用於對華外交政策上。就護僑政策而言，日本也如同過去西方國家對日本所做的行為一般，以護僑為理由侵犯中國主權。毫無疑問，這些日本的軍事外交行動使得中國產生對日本的嚴重戒心，對日本的負面情感日積月累，最終醞釀出排日、仇日情緒，逐漸形成大規模的排日運動，乃至對中日關係造成影響。

一戰結束前後，日本修改對華外交方針，積極支持「國際協調主義」，基本上反對干涉中國內政，與此同時，中國的收回國權意識日漸提升，使得日本在華權益也受到影響。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在美國召開的華盛頓會議上圍繞漢口日本陸軍的處置，中日雙方進行了激烈辯論。中國代表批評說，日軍駐紮漢口並無條約依據，要求日方應立即撤離軍隊。此時，日本代表反駁，表示目前中國國內狀況動盪不安，必須派駐軍隊保護該國僑民的安全。<sup>90</sup>華盛頓會議後，日本陸軍提議盡快撤退漢口派遣隊，日本外務省也對此表示同意。1922年5月6日，日本內閣決議撤退派遣隊。<sup>91</sup>20日，日本駐華公使小幡西吉會晤中國外交總長顏惠慶(1877-1950)，根據小幡西吉的說明與解釋，小幡西吉曾對日本外務大臣內田康哉說：「必須在解決山東問題以前實行撤兵，內田大臣頗以為然也」，但「只因彼時適值奉直開戰，未便即行，現在戰事已將告終，不久必可實行。」<sup>92</sup>30日，小幡西吉會晤中國外交次長沈瑞麟(1874-1945)，並正式對中國政府通告日軍自漢口撤退，次長回答說：「貴政府尊重華府決議，並注重中國朝野之意見，決將駐漢口日軍撤退，余聞之甚為欣慰。此後僑華外人之生命財產，政府必飭地方官力加保護，此點貴使儘可安心。」<sup>93</sup>1922年7月2日，漢口派遣隊完

<sup>90</sup> 櫻井良樹，《辛亥革命と日本政治の變動》，207-209。

<sup>91</sup> 櫻井良樹，《辛亥革命と日本政治の變動》，210-211。

<sup>92</sup> 〈駐華日本軍隊事〉，1922年5月24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03-33-055-01-008。編號420，總長會晤日本小幡公使〔西吉〕問答，1922年5月24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日關係史料 軍事外交交涉 中華民國七年至十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284。

<sup>93</sup> 〈撤退漢口日軍事〉，1922年5月30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03-33-055-01-009。編號421，次長會晤日本小幡公使〔西吉〕問答，1922年5月30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日關係史料 軍事外交交涉 中華民國七年至十年》，284-285。

# airiti

· 198 · 朝野嵩史

成撤軍，長達 10 年的日本在漢口駐軍在此告終。

日本以及其他西方各國隨著一戰結束前後的國際秩序的變化，也修改對華外交政策。但列強仍以護僑為由，動用海軍力量，尤其日本在北伐戰爭時期藉口護僑，斷然出兵山東，導致中日軍事衝突的爆發。以此觀之，護僑也許是從晚清到民國的中外關係裡，其中一個關鍵且帶有連續性的議題。

## 徵引書目

### (一) 檔案

1. 《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2. 《清国革命動乱ニ関スル情報／海軍ノ部 第一卷》，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3. 《清国革命動乱ニ関スル情報／海軍ノ部 第二卷》，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4. 《清国革命動乱ニ関スル情報／海軍ノ部 第三卷》，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5. 《清国革命動乱ノ際東亞同文会ニ於テ同国各地へ駐在員派遣一件》，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6. 《清国革命動乱後ノ状況ニ関スル各省及府県庁報告雜纂／陸軍省及參謀本部ノ部 第一卷》，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 (二) 史料、史料匯編

1.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44卷、第45卷、別冊，清國事變(辛亥革命)》，東京：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61。
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日關係史料 軍事外交交渉 中華民國七年至十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3. 東亞同文書院編，《東亞同文書院大旅行誌》，5 孤帆雙蹄，東京：雄松堂出版，2006。
4. 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國父全集》，第2冊，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
5. 程道德，《中華民國外交史資料選編(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

### (三) 報紙、雜誌

6. 《大公報》(天津)。
7. 《申報》(上海)。
8. 《東京朝日新聞》(東京)。

### (四) 專書

9. 北岡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 1906-1918年》，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9。
10. 北岡伸一，《官僚制としての日本陸軍》，東京：筑摩書房，2012。

# airiti

· 200 · 朝野嵩史

11. 外交部編，《中外條約彙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4。
12. 佐藤元英，《近代日本の外交と軍事—權益擁護と侵略の構造—》，東京：吉川弘文館，2000。
13. 杜恂誠，《日本在舊中國的投資》，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
14. 沈殿忠主編，《日本僑民在中國》，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
15. 林家有主編，《辛亥革命運動史》，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
16. 俞辛焞，《辛亥革命期中日外交史研究》，東京：東方書店，2002。
17. 畠山秀樹，《三菱合資会社の東アジア海外支店—漢口・上海・香港—》，大阪：追手門學院大學出版會，2014。
18. 黃福慶，《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
19. 橫濱對外關係史研究會、橫濱開港資料館編，《横浜英仏駐屯軍と外国人居留地》，東京：東京堂出版，1999。
20. 櫻井良樹，《辛亥革命と日本政治の変動》，東京：岩波書店，2009。
21. 櫻井良樹，《華北駐屯日本軍：義和団から盧溝橋への道》，東京：岩波書店，2015。

## (五)論文

22. 王金山，〈民國元年北京兵變詳考：兼談史料與北洋軍閥史研究〉，濟南：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23. 李少軍，〈民國初期在漢口之日本陸軍派遣隊述略〉，《近代史研究》2(2013): 79-96。
24. 李盈慧，〈「民國」政府保護「國民」：民初革命黨的保僑交涉與建言〉，收入麥勁生、李金強編著，《共和維新：辛亥革命百年紀念論文集》，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3。
25. 林於威，〈閩臺海底電線與中日交涉之研究(1895-1904)〉，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0。
26. 胡峰，〈黎元洪與民初政局〉，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
27. 陳志剛，〈1926-1941年美國在華武力護僑政策研究〉，南京：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論文，2014。
28. 瀨川善信，〈日清戦争(1894-1895)における居留民保護問題—在清公館引揚との関連において—〉，《埼玉大學紀要社會科學篇》24(1976): 1-21。
29. 瀨川善信，〈北清事変(1900年)における日本陸軍出兵問題—居留民保護との関連において—〉，《埼玉大學紀要社會科學篇》29(1981): 1-31。

## **Japan's Diplomatic Measur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Japanese Nationals Overseas during the Xinhai Revolution Period**

Asano, Takafumi

Ph. 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n October of 1911, Wuchang Uprising broke out, after the success of the uprising, many provinces declared independence, and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stablished in Nanjing, in finally Qing dynasty came to an end. During the revolution, Britain took the initiative in the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over the Chinese problems. After the negotiations, Qing emperor abdicated the throne, and the Peking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ified the country finally. The Xinhai Revolution changed the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society dramatically, on the other hand, foreign people had been effected seriously in China. During the revolution, the Great Powers not only dispatched an army to protect the nationals, but also strengthened the military power in China. In those days, Japan strengthen the military power and expanded the interes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Japan's diplomatic measures for the safety of Japanese nationals in China.

**Keywords: Sino-Japanese diplomacy,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s overseas, Japanese nationals overseas, Xinhai Revolution**